

对书法纸张“装饰风”的审思



如今,书法展览十分繁荣,参与人数众多、作品体量大。然而,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部分展览中难觅素净笔墨的从容对话,取而代之的常是满壁斑斓的染色纸、拼接做旧的色块,以及烧边蛀痕、手绘界格、繁复印章层层铺排的各种“花样”。这些“视觉系”作品构成了一道不容回避的展厅景观,也催生了一个值得深究的命题:当书法的物质载体从素朴的“纸本”演变为精心设计的“装饰”,我们究竟是在趋近书法本体,还是在悄然疏离?

这种变化的动因,需要置于当代书法展览文化的语境中加以审视。与传统书斋雅玩截然不同,现代展厅是标准的公共展示空间——展墙高阔,灯光强烈,作品之间存在着无声的视觉竞争。一幅尺幅有限、素白无饰的作品,在这种空间中往往容易被“吃”掉,缺乏足够的视觉冲击力以挽留观者的目光。与此同时,数十年来书法评审机制中“形式构成”维度的权重提升,也为纸张经营提供了诱因。在此背景下,染色、拼接、做旧等手法,便从少数人的自觉探索,逐渐演化成为一种普遍的创作策略。

平心而论,适度的纸张处理,确实能在特定情境下增益作品的审美效果。一张仿古笺纸写禅宗诗偈,纸色与文辞的氛围相呼应,令观者更容易进入作品的

精神情境;几块协调色纸的拼接组合,可为巨幅创作化解章法难题,避免大而无当的空疏;甚至某些特殊纸性对笔锋迟涩、墨色晕化的微妙改变,也能引出意料之外的笔墨意趣。在理想状态下,纸张经营是“纸墨相发”的现代延伸——其手段服务于书写,其效果衬托出笔墨。

然而,现实的走向远比理想复杂。当“巧饰”不再满足于服务性的配角地位,转而谋求视觉主导权时,一系列深层隐忧便浮出水面。应该看到,过度装饰正在改写书法创作的内在逻辑。书法之为艺,核心在“一笔书”的气脉贯通。孙过庭《书谱》云“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揭示的正是书写过程中前后映带、一气呵成的本质。但当下不少拼接作品,预设的色块格局已经框定了书写区域,书者须在不同纸块间中断、移位、再起笔,甚至反复补笔以求整体视觉效果,读起来气若游丝。这种“由外而内”的创作模式,实质是将书写切割为填充行为。古人亦用拼接之法,然多在书成之后,借托裱接缝以成卷轴,书写之际,笔势未尝中断,气脉自是一贯。今人之拼接则往往本末倒置,先构形式,后施笔墨,以设计统摄书写,遂使“书为心画”的直接性荡然无存。观者最终面对的,不过是一幅经营过的色彩构成,而非一段沛然流畅的心灵律动。

与之相伴的,是笔墨核心价值的遮

蔽。过度仿古染色,尤其是那些以浓重茶渍刷就的“酱油底”,往往令墨色浮于纸表,难以呈现笔锋“力透纸背”的层次;烧边、打磨、伪造蛀痕等手段,更是将注意力引向做旧的“仿真术”。当一件作品远观古色古香,近看却点画空怯、笔力孱弱,那斑斓纸色便不再是承载,也绝非“纸墨相发”,而是地地道道的“纸墨相妨”,反差失调。

片面追求纸张的“装饰风”,也容易引起审美导向的偏移。展厅是书法与社会审美交流的主要场域,展览作品的取向直接影响着大众认知。当形式花哨之作在展厅中反复出现并获得关注,一个潜在信号便被释放:纸张经营能力似乎等同于书法创新能力,视觉震撼度似乎可以替代笔墨精气神的深度。这使得讲究笔法、气韵但形式质朴之作容易被边缘化,后学者也易误入“重纸面功夫而轻笔墨根本”的歧途。长此以往,书法在追逐视觉刺激的过程中,或将丧失自身深沉静穆的文化品格。

回归“本色”,并不意味着回到单一的素白宣纸,拒绝一切形式探索。书法史上,唐人染硬黄以写经,宋人制粉蜡笺以显贵,明代盛行泥金笺以增华彩,适度的材料经营从未被排斥。问题的关键,在于守住一条尺度底线:纸张装饰必须是书写表达的自然延伸,而非凌驾于书写之上的预设主宰;必须是增益笔墨表现的助力,而非遮蔽笔墨不足的眼障法;必须让观者最终记住的是作品的精神气格,而非一张“好看的纸”。

书法最动人的力量,从来不在附加其上的脂粉,而是在素毫落纸那一瞬间的诚恳与内心修为。在展厅视觉诱惑日增的今天,书者当谨记“用纸而不为纸所用”,观者亦当学会拨开斑斓纸色,谛听那黑白之间最素朴也最深刻的心弦颤动。毕竟,一切外在装饰终将随岁月褪色,唯有笔墨真实的深度,才能让一件书法作品长久地住进人心。而这,或许正是我们在“巧饰”与“本色”之间应当保持的那份清醒与自觉。

据《光明日报》作者:徐保民

景区不妨听听大家的“出片”需求

旅游旺季热帖多,不止于风景、美食、游玩项目,能否“出片”也是众多游客关心的旅游攻略内容,不少旅行社和景点也打出“定制路线,包出片”“指导角度,随手拍都出片”的广告来招揽游客。当获得一张“不虚此行”的照片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需求,当“旅拍定制师”成为新职业,景区发展应当听见“新声”,应时而动。

在社交媒体上,“出片”是流量密码、社交货币,这种网络文化现象从诞生之初就与文旅产业密不可分。一张构图、表情、氛围俱佳的“人生照片”,已不单是旅途的“副产品”,有时甚至是出行的主要目的。从地点、氛围到服饰、妆容再到后期修图,“出片”的过程不仅是游客的独家记忆,有时还会成为景区的“活广告”。比如随便搜一搜赛里木湖的旅游攻略,松树头、果子沟、金莲花海都有高赞“出片”机位,不少网友还会仔细给出拍摄攻略,留言区里想去赛里木湖的心情也达到了顶点。

相比传统的景区营销,这种纯个人视角的宣传,更容易让人共情,催生行动意愿。游客在精心构图的过程中,也从单纯浏览转向了主动“二创”,丰富了景区游玩体验。由此看来,无论基于游客需求,还是考量文旅产业发展,都应在匹配景区环境的基础上做好视觉效果升级,让游客定格美好记忆。比如青岛市曾为了让游客不用调角度就能拍好“孤独的树”,挪移树下的指示牌,在画面里避开不协调因素,把审美和服务统一在积极行动里。

当然,随着想要“出片”的游客越来越多,景区不仅要在基础建设、美学构思上提升水平,还要从安全、便利、有序等服务角度做好引导。不少网友表示,有些随时随地在追求“出片”的游客影响了其他人的游览体验,还有些为了拍出网红角度忽视安全问题,更有甚者为了效果“惊艳”,做出有违文化氛围甚至挑战公序良俗的行为。针对此类不良现象,一方面需要通过宣传和引导加强游客自律,另一方面景区也要做好相关管理,让“出片”这一发现美的行为也成为景区美好感受的一部分。

“出片”虽出彩,求美先求真。达人博主晒图里的粉红色浪漫沙滩,现实中只是一片红土滩;散发着人间烟火气息的探店美图,现实中走进店里都未必能认得出——虽然说能把不起眼的场景拍成富有文艺气息的照片,也是一种发现美、欣赏美的能力,但有些网络博主展示出来的“旅拍”“生活笔记”等并不是单纯的分享,而是有商业目的的。过度夸张和美化内容看似唯美浪漫、令人神往,实际却让人大跌眼镜。文旅从业者如果在宣传中借助“出片”误导、欺骗消费者,那不仅是不真诚的问题,严重的还涉及虚假宣传,属于违法行为。

“出片”是审美需要、是生活热情,更是消费场景更新。围绕“出片”的服务链不断延伸,能够满足进一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必将在文旅产业中催生新增长点。

据“学习强国”平台 作者:张蓓



人工智能当有四重“文心”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言:“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所谓“文心”,是贯穿文脉、承载情志的用心与修为。千年之后,当人工智能深度融入人类社会、重塑文明形态,这句古老的文论也映照出一个更深邃的时代命题:当机器开始模仿人类的言语与思维,它是否也应拥有一颗“文心”——一种浸润着文化体温、恪守人文道义的内在灵魂?

人工智能有“文心”吗?这问题看似科幻,实则早已进入工程实践的腹地。科学家们努力通过“价值对齐”的技术路径,将人类伦理与文化偏好“内嵌”于算法之中。海量原始数据预训练如同童蒙博览诵经,监督微调的算法定向塑形仿若师者传道授业,而人类反馈强化学习则近似于长辈不厌其烦的言传身教,层层完成机器的价值校准与心智塑造。一台不识字的老式织机尚且承载着千年的经纬智慧,何况今日以“智能”为名的大模型?

在近期于上海召开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中国正式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四点核心意见,为全球智能产业良性发展、完善AI治理体系给出中国方案。若将这四点意见置于中国文化的深层语境细细咀嚼,便会发现,它们恰好对应了人工智能应当修习的四重“文心”境界,是

技术向善、科技载道的东方修为。

第一重,谓之“日新”。开放共赢、驱动创新,秉承的是《周易》“穷则变,变则通”的生生之道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包容胸襟。若AI只知闭门造车、固守一隅,便辜负了技术的天命。它应当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像当年的青铜与丝绸,赋能千行百业,在经世致用中实现自身价值,在持续迭代革新中焕发长久生命力。

第二重,谓之“忧勤”。《周易》言“安而不忘危”,《礼记》讲“凡事预则立”。这种深植于中华文明的忧患审慎意识,投射到AI治理上,便是坚持安全可控、底线思维,确保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部分西方技术浪漫主义思潮片面追逐技术“奇点”,极致突破技术边界;而植根中华文脉的主流技术观,则始终看重人伦秩序、以人为本的核心底线。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更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推己及人——科技不应成为割裂世界、构筑壁垒的砖石,而应化作联通各国、普惠众生的通途桥梁。

第三重,谓之“和而不同”。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费孝通先生将其阐发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当下,西方主流大模型以英语语料为核心基底,不经意间成为消解文明多样性的隐

形压路机。而中国主张AI发展不能侵蚀各民族文化独特性,倡导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智能体系的内核灵魂。这无异于在算法的冰冷逻辑中植入了“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的古老智慧——AI应当成为沟通多元文明、消解认知隔阂的桥梁,而非抹平文化差异、固化单一范式的碾盘。

第四重,谓之“天下为公、和衷共济”。《礼记》描摹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与《论语》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者襟怀,共同构筑了中国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深厚文化底色。中国始终主张发挥联合国核心作用,完善全球AI治理体系,助力“全球南方”弥合数智鸿沟、共享数字红利,其深层动因是超越狭隘功利主义的传统“义利之辨”。此理念旨在规避新的数字发展不公,杜绝人工智能革命沦为“第二次数字殖民”,这份对全球科技公平正义的执着,饱含着绵延千年的人文历史体温。

综观之,中方四点治理意见,正是以中国的整体论世界观、忧勤审慎的风险思维、中和包容的文明理念、天下大同的格局胸襟,为人工智能勾勒出一套完整的“心性图谱”。它传递着一个久远而清醒的东方判断:技术从来不是绝对价值中立的冰冷工具,技术必须载道前行、向善而行。 据《中国文化报》作者:行思